

《大连近代史研究》 编辑委员会

主 任：王星航

副主任：王家胜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星航 王家胜 王珍仁 尹淑杰

华文贵 吴青云 周爱民 褚庆玉

谭晓玲 潘茂忠

主 编：华文贵

副主编：王珍仁

编 务：周爱民 由林鹏

· 卷首语 ·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

华文贵

2007年是“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在沈阳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侵华战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进行全面侵华战争。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取得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残酷洗礼，从而实现了整个民族的浴火重生。这场锻炼与考验是全面的、深刻的，同时也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追溯中国现代化的滥觞当在19世纪60年代。在经过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一些封疆大吏清楚地感到在列强虎视眈眈之下所潜在的长远威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喊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声音。以“求强”、“求富”为目的，提倡在军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中，向西方国家学习，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较大的一步。但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绞杀面前，这种现代化的追求最终却

被腰斩于甲午战争。甲午战败后，由于巨额的战争赔偿，清政府基本上没有财力来从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设。民国建立后，又出现了军阀割据，政权更替频繁，再加上列强对军阀各派的直接或间接的操纵，扩大地盘或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各派的首要目标，根本无心从事现代化的各项建设。但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列强忙于欧洲战争，放松对华侵略，从而使得民族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迎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短暂的春天。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的现代化又再次陷入停滞的状态之中。

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又在何方？

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枢纽，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开辟出了道路。

中华民族要复兴，一是要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二是要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的抗日战争肩负着双重任务：即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在“灭种亡国”的危境中开辟了民族的新出路。同时，抗日战争也激发了广大人民对加速发展中国现代化的热情。

在政治层面上看，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在“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治派别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这种民主尽管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政治和民主的基础。

在经济层面上看，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为了支持前线对日作战，政府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统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

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因为抗日战争形势的要求，致使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在思想层面上看，抗日战争时期使中国社会与民众近代思想意识得到启蒙、提升。具体表现在：第一，国难当头民众团结救国目标的高度一致；第二，把抗战与建国融为一体，建国的内涵已不仅仅是维持战争的物质建设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主思想的初步教育和普及；第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地区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行和其示范影响，包括组织各种民众团体和从扫盲开始的各类启蒙活动，意义深远；第四，民主党派的建立和活跃，形成了在野的政治制约力量；第五，抗战大大提升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推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这些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本质性的进步，不仅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保障条件，而且为后来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在主权层面上看，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4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独立的主权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总之，回顾近代中外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在以现代化为既定目标的前提下，需要寻求民族精神与现代化完满地结合。抗日战争让中华民族看到和认清，只有有效学习并汲取外国现代化的

优长和经验，防止和克服民族自大或自卑心理，才能摆脱落后，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今天，中国不但早已在抵御外侮中取得了完全胜利，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我们在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在某些环节上又似乎失去了近代以来在逆境中学习西方时的热情。同样我们至今没有对近代屡败于日本侵略的教训作出令人信服的总结，对抗战胜利后现代化竞争中，中国何以长时间滞后于日本社会的根源也缺乏足够的思考。因此说我们在今天应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地研究过去的历史，深入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在今天振兴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应有的基本要求。

〔作者：华文贵 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大连市社科院特邀研究员 大连 116041〕

目 录

卷首语 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 华文贵

中日关系史研究

从中日关系看“东亚共同体”

——以“历史认识问题”为中心 洪伟民 (2)

近代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及其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破坏

..... 吴丽华 (19)

论抗日战争中的中日思想战之日本观 刘恩格 (28)

论日本近代的“皇国史观” 刘淑梅 李 箭 (42)

简析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因素 黄志强 (52)

甲午、日俄战争研究

1886年北洋舰船长崎油修起因探析 孙建军 (62)

甲午丰岛海战“济远”舰尾炮退敌说辨伪 陈 悦 (79)

证据法视角下的丁汝昌自杀案 简 珺 (95)

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政治原因 于春梅 (111)

论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思想战” 周 彦 (119)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同盟外交 邢丽雅 (129)

论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两者间的关联 徐凤江 庞 晶 (141)

佐渡丸 [日] 菊池宽 著 王丹菲 译 (149)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研究

大连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宗抗日斗争案

——日本当局在侦办抗日谋略团一案中迫害大连工人的罪行

..... 刘功成 (160)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始人黄显声将军 穆景元 (176)

笑傲死亡的抗日名将——王凤阁 赵娅丽 (185)

试论马占山与两海抗战 王 丽 (192)

概述关内满族人民抗日斗争 关 捷 杨惠萍 (200)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史研究

中共大连特别支部的建立 陈光真 (214)

鞠躬尽瘁 为国为民

——记东北地下党早期领导人王立功 刘 影 (222)

白山黑水映丹心

——记大连党组织早期领导人童长荣 徐 杰 (233)

信仰在心中 奋斗于足下

——记中共大连团委早期负责人纪锦章 刘志民 (244)

铁打的筋骨 不屈的人格

——记“四·二七”大罢工领导者侯立鉴 罗虎堂 (254)

日本殖民统治史研究

关东州殖民统治机构建立、演变状况述论

..... 郭铁桩 王 健 (264)

关东州财政及其为日本筹集战争经费的措施

..... 韩俊英 张 越 (287)

试论伪满洲国金融的特征	刘 辉 于丽群 (301)
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时期航运业的发展	崔再尚 (310)
大连顺兴铁工厂探析	冷绣锦 (320)
论“满铁”对华的文化侵略与渗透	王珍仁 (333)
论伪满殖民统治文化特征	陈春萍 田丽梅 (348)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的特点	于耀洲 (360)
从日本在辽宁教育方针的演变看殖民教育的本质	张淑香 (370)
大连人民反抗日本殖民教育和文化统治的斗争	薛志刚 (379)
1907~1932 年的大连海关	由林鹏 (386)
旅顺刑务所医疗卫生制度的设立与变迁	周爱民 (400)
日俄殖民统治时期发行的有关大连地区明信片	刘俊勇 (416)

历史方志文化研究

大连清季清官廉吏谱	王万涛 (438)
大连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徐松岩 (448)
略谈俄日在大连地区的移民	关国磊 (461)
俄日殖民统治大连时期的旅游业	潘 研 (469)
历史要求真求实 ——关于一些书报刊载近代史实的订正	耿 政 裴 臻 (472)
十年功夫，磨成一剑，为史册增辉 ——读《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母 轶 (488)
编后记	《大连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493)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4卷

中日关系史研究

从中日关系看“东亚共同体”

——以“历史认识问题”为中心^①

洪伟民

摘要：日本欲借美国之力迫切地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以便在经济以外的领域也有更多的空间。但其想成为“政治大国”的首要障碍就是“和平宪法”，而要修改和平宪法必然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但日本不愿意像德国那样对“历史认识问题”予以彻底清算，以致形成中日在这个领域的不和，最后也影响到两国的经济上来。本来“东亚共同体”是为东盟与中日韩提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合作平台的，但因为“10+3”最主要的中、日、韩的不和，必然会影响到各方的合作。安倍新政权虽然因现实原因回避了“历史认识问题”，但笔者认为，只要“历史问题”不解决，“东亚共同体”的合作在短期内必然难以进行。未来，安倍政府将主要以“中国军事威胁”为借口来达到其“修宪”的目的。

关键词：历史认识问题 东亚共同体 靖国神社 中日关系

有关东亚或东亚文化、经济的话题，早已有众多学者予

^① 本文曾于2006年9月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召开的第16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文化的继承与扬弃——东亚共同体文化基盘形成之探讨”会上作过发言，这次正式发表作了大幅改写和增删。

以了论述^①，而“东亚共同体”的论述，虽然其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长，但围绕这一话题的论述却非常多。其中有期望通过用“儒学精神”来推动东亚合作与发展的；有认为应该从文化等综合因素考虑的。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康武教授2006年10月30日在参加北京的旨在研究东亚合作问题的东亚合作联合研究大会表示，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不可将经济一体化与其他领域的一体化分割开，可以以经济领域的合作为切口，但不可只关注经济领域，还需要包括其他领域诸如政治、文化、安全、教育培训等。在同一大会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翟昆博士也表示，“经济是东亚共同体现阶段的建设重点，但以后会逐步向其他方面过渡。”此外，与日本相关的除了有很多的单篇论文以外，还有不少专著做不同阐述^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8月由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提出的鸿篇政策报告更格外引人注目。

2003年9月曾在中国召开了东亚智囊联络会。代表日本智囊出席的是“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的伊藤宪一。会后，2004年5月18日，伊藤宪一与日本外务省商量成立了官民一体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由原首相中曾根康弘任会长，伊藤宪一任议长。该会集齐了日本国际论坛、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平和安全保障研究所、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等智囊代表以及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青木保、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吉富胜等精英和企业代表等70余人。2005年8月，CEAC耗时年余，推出了由伊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编的《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崔新京主编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东北与日本》，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徐静波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与政治经济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李文的《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至于单篇论文的数量就更是惊人了。

② 小原雅博：《東アジア共同体——強大化する中国と日本の戦略》，日本経済新聞社，2005年9月；谷口誠：《東アジア共同体——経済統合のゆくえと日本》，岩波書店，2004年11月。

藤宪一主持、青木保等辅助的、题为《东亚共同体构想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政策建议报告，其内容长达十数万字。该《报告》由前篇《考察》部分和后篇《提议》部分构成；前篇说明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和现状，后篇则提示了日本的战略原则和应对政策。虽然不是政府文件，不具有政策指导力，但它显然对日本的相关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2005年10月，日本的《外交论坛》杂志社编辑了一期由专家、学者和精英论述“东亚共同体”的专集^①。

在上述各种论述中，中外学者就“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作了各种说明。而日本学者中不乏把引起中日两国不和的靖国神社仅仅看作是两国间的“价值观”问题^②。也有人认为“日中关系恶化的根本要因是两国间缺乏信赖关系”，中国不应该把“过去的历史问题政治化”，因此，“为了安定未来日中两国关系，有必要再确认日中关系诸原则”，同时向各自的国民讲述“两国间经济面上有互补关系，在东亚地域社会的构筑以及能源和环境等全球化问题上有共同利益”^③。中国学者虽然也有将此作为问题予以提出的，但更多的还是在如何发展“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上予以了阐述。

而笔者恰恰认为，正是因为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了中日之间的发展，由此而引出的两国间的相互不信任关系，必将影响到“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期望通过经济的互补发展就能解决中日间的矛盾、发展“东亚共同体”至少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

一、“东亚共同体”概念产生的经过

“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通常的一个说法是由日本首相小

① 《外交フォーラム》，2005年10月号。

② 古森義久：《「東アジア共同体」への疑問》，《産経新聞》2004年12月4日。

③ 田中均：「二十一世紀日本外交の戦略的課題」，《外交フォーラム》2005年10月号，10页。

泉纯一郎提出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是韩国最早提出的^①。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春树却认为森屿通夫最早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概念。其实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了“东亚经济集团”这一概念,只是当时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因为美国的原因也表明了反对的态度;其后,东盟国家还提出过集团化意思不强的概念,美国也不赞成。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RF)成立;1996年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召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同年,首届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领导人会议召开;200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10+3”会议上基本确认将来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2002年的“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EASG)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报告;2003年底,日本和东盟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也确认了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一目标。2004年9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联合国第59次大会上做了《迈向新时代的新联合国》演讲,其中再次提到“东亚共同体”。2005年12月的东亚峰会上,各国已经确定了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

在中国,APEC成立之初,我们曾特别忌讳提“共同体”这个词,而是以“大家庭”一词取而代之。后来在张蕴岭等学者的推动下,“东亚共同体”概念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②。

从东亚的地理概念来讲,如今所谓的“东亚共同体”大多是指“10+3”的概念、亦即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因此,原外长李肇星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应坚持以10+3为主渠道推进东亚合作”和“应坚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

① 小島朋之:《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日中協力》,載《アジア研究》,2005年,第2期,21頁。

② 張蘊嶺:《為什麼要推進東亞區域合作》,載《國際經濟評論》,2003年,第9/10期。

主导地位”的基本原则^①，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不主张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的参与，但很显然与日本提出的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主张不符^②。中国显然担心由于美国的参与将会变成由美日主导的“东亚共同体”^③；同样，美日也担心“东亚共同体”会变成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经济联合体，所以才会有美日最初的反对。2005年12月的吉隆坡东亚峰会上，日本一直极力想塞入草案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未见提及，也可以看作是中日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吧。

二、制约“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因素

在“东亚共同体”的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要想完成“东亚共同体”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可以说，在短期内，要想完成“东亚共同体”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

1. 历史问题的认识

如果考察导致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诸因素的产生，则不难发现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最为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贸易地位的变化。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展开全球性贸易、投资活动的条件更加完备，对外贸易的领域前所未有地拓展。这些影响让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以贸易立国的日

① 2005年7月27日李肇星外长在老挝万象的发言中强调：1. 我们应坚持以10+3为主渠道推进东亚合作；2. 我们应坚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3. 我们应坚持务实共赢的原则，深化具体领域合作。4. 我们应保持合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与本地区其他合作机制和谐共存。5. 我们应发扬创新精神，不断总结合作经验，认真规划未来合作。

② 日本多次提出“10+3”以外还应加入澳、新（西兰）印（度）等3国，即形成“10+3+3”的形式。2006年2月13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一届东北亚论坛”上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又提出了“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即“10+3+5”的新计划。

③ 2005年7月27日李肇星外长在老挝万象的发言中特意强调第二点的“东盟在东亚国家中是大多数，是东亚合作的倡导者和主要实践者。东盟不断深化内部合作，为东亚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东盟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照顾各方利益平衡。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有利于东亚合作的顺利发展”。

本忽然发现,当经济不再有优势时,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有了。这促使了日本要更加快速地成为一个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军事上、政治上——不管是地域政治还是全球政治——有发言权、拥有自己军队的“正常国家”。

本来,日本想成为“正常国家”的心情也是不难理解的,但在成为“正常国家”的时候,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日本将修改和平宪法、保有军队。对曾经遭受过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的受害国来说,日本政府就有义务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问题以取得邻国的信任。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未能像德国那样彻底清算过去的历史,并从法律上加以清算和抑制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不仅如此,日本的每届内阁几乎总有个别大臣要出来不断地“失言”或“暴言”以否定或美化那场战争^①;1997年日本国内还出现了以历史教授和作家等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组织,旨在否定日本进行过的那场“侵略战争”,称对战争进行反省和道歉是“自虐”行为^②;2001年4月3日,文部省第一次通过了由该会编撰的新教科书的鉴定;2005年4月5日又通过了经过修订后的《改定版新历史教科书》和《新订版新公民教科书》。由于很多资助新教科书编撰的企业在中国投资赚钱,被部分愤怒的中国年轻人视作赚了中国人的钱来伤害中国人,继而爆发了以京沪为主的部分地区的“反日”示威游行。

因此,在历史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日本政治家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下,小泉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就会被人联想到日本历史上曾经提出并付诸于行动的“大东亚共荣圈”。其结果,当然会让人觉得一边想着“东亚共同体”,一边想着“大东亚共荣圈”,实在是没有诚意的行为。

① 保阪正康:《战后政治家的胡言录》,中公新书,2005年。

② 1997年1月30日,由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主宰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该会成立后即把目标定为消除该年度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从军慰安妇问题”,宣言“编新历史教科书、修正历史教育”。新历史教科书在全国使用率的目标数是10%。同时改由教师主导采用教科书为各地方自治体教育委员会主导。

也许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了日本国民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相比优越感的消失和“中国威胁论”的盛行,这些因素是导致近年来日本民众厌华情绪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历史认识问题等也是双方国民相互不信任的原因。这种国民情绪的对抗,直接导致了两国间不信任感的不断增强。据2005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府发表的2005年度“外交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占32.4%,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值;反之,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高达63.4%,创历史新高^①。

另一方面,中国在1999年对700名北京人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重大利益怀有敌意,而且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中国造成了威胁。2005年6月,对4000名中国市民的调查显示,71%的人对日本没有亲近感。更让人悲观的是,中日两国学者于2005年8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3%的日本受访民众和56%的中国受访民众担忧两国关系将来会恶化或者不确定。中国大学生的态度甚至更加不乐观:81%的人认为未来中日两国关系不确定或是悲观的。对于造成这种更加悲观态度的原因是,有93%的中国大多数民众认为,日本对两国关系的恶化应负全部责任。日本民众对责任的看法好像较为公平客观一些。8月份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为目前的紧张关系独自担责^②。

对此,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认为,影响民调结果的主要是教科书问题、竹岛(韩国称独岛)问题、中国的“反日”游行问题等。此间有媒体指出,日本民众对中韩好感急速下降的最大原因

① 从1975年开始,日本每年进行一次为外交战略作参考的民意调查。2005年的调查是在10月上旬完成的。调查当时日本首相小泉的第5次参拜靖国神社还没有发生。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感到最亲近的是美国,为73.2%;感到韩国亲近的跌落到51.1%;而感到中国亲近的则降至32.4%。认为中日关系好或者不好的民调结果则分别下降和上升了10个百分点左右。

② 裴敏欣、寇丹妮:《中日言论的恶性循环》,载《财经时报》,2005年11月21日。

就是因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中韩等国的反击，中韩的反应又招致日本国民对两国好感下滑，如果民调在首相参拜之后进行，结果势必更糟。而中国方面也认为“其中根本原因就是日方在台湾和历史等问题上不断采取错误言行”^①。针对日本民众“嫌韩厌中”情绪高涨，小泉却不以为然地辩护说：“那只是所谓的好感、亲近感。从客观来看，这些都不会影响到经济交流。”^②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国民对历史认识的不同，影响了两国间的关系。尤其是民间的互不信任，使得两国间的合作难以成行或成为不可能。实际上，连日本的一些商界高管都不得不承认，由于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日本公司的在华业务正处在危险之中^③。其结果，当然会影响到作为“东亚共同体”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实际上，日本政府也在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大肆渲染投资中国经济的风险，有意引导企业减少对华投资，转而投资越南、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在对华投资时要实施“中国加一对策”，即日本企业如果要在华投资，同时也应该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如越南、泰国建立一个同样的工厂的对策，这样一旦中国发生风险，可以用另外一家工厂替代^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政府判断中国政府不希望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扩大到经济领域，于是就坚决打经济牌，指导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时慎选中国，以此来牵制中国。事实证明，日本政府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并不是毫无效果。2005年11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开发金融研究所对日本企业对外投资计划进行例行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企业未来计划中对华投资热情降低，认为投资中国存在风险的企业增加，投资时需注意分散中国风险的警告得到了认可^⑤。

① 2005年12月27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主持例行记者会答记者问。

② 《联合早报》，2005年12月28日。

③ 2006年5月28日美国《洛杉矶时报》《日企高管敦促日本政治家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转引自2006年6月29日《参考消息》，第6版。

④ 见日本政府2005年版《制造业白皮书》和《贸易白皮书》。

⑤ 引自2006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金柏松：《日本政府打经济牌牵制中国：指导企业转移投资》。